

# 批判性思维视域下的竞技辩论:迷思与澄清

廖彦霖

(中山大学 哲学系/逻辑与认知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220)

**摘要:** 竞技辩论常被视为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手段,然而学界对竞技辩论仍长期存有两大迷思:一是伦理迷思,即抽签定持方的制度导致伦理困境;二是价值迷思,即竞技求胜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初衷相悖。这些迷思可在批判性思维的视域下获得澄清:竞技辩论既有利于形成健全的信念,也不涉及对表述真实信念的公开承诺,故伦理困境得以化解;竞技辩论是批判性思维的实践演练,其竞争机制有助追求更好的论证,故求胜是求真的助推器。

**关键词:** 竞技辩论;批判性思维;论辩;论证理论

**中图分类号:** B8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23)01-0047-07

在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的培育过程中,论证能力(亦即对论证进行分析、评估与建构的能力)无疑是一项核心培养目标。而竞技辩论作为一项生动的论证实践,常被视作培育论证能力的有效手段。不管是在逻辑学等学科的专业课堂,还是作为校园思辨文化的展示活动,竞技辩论时常发挥独特作用。然而,不少学者对竞技辩论仍心存疑虑,并从伦理与价值两个维度对其展开批评,认为其无助甚至有碍于批判性思维教育。本文将上述批评称之为竞技辩论的两大迷思——即“伦理迷思”与“价值迷思”。对于竞技辩论的相关问题,国内学界往往只关注应用层面的教学案例分析,但就其根本的理论疑难则未见系统的辨析。本文将基于批判性思维的视角,尝试对竞技辩论的迷思作出分析与澄清,力图为其作为教育手段的理论合法性提供辩护,进而对批判性思维教育提供更坚实的方法论支撑。

## 一 批判性思维视域下的竞技辩论

恩尼斯(Robert H. Ennis)提出了一项广为接

受的批判性思维定义,即“批判性思维是带有合理性、反思性的思维,其目的在于决定我们相信什么或做什么”<sup>①</sup>。围绕该定义,批判性思维的主要内容包括语义分析、定义理论、证据评价、科学方法论、基础数理逻辑、论证识别、建构与评估、修辞与谬误分析、认知偏差等。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批判性思维的兴起助推了逻辑学的实践转向,对逻辑教育和逻辑学科的发展均产生深远影响<sup>②</sup>。如今,培养批判性思维已成为高等教育乃至国民教育的基本共识。

论证能力是批判性思维或逻辑应用的核心能力之一。论证,指的是一种理性的社会言语活动,其目的在于用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命题来证成观点,让理性批评者心悦诚服地接受立场<sup>③</sup>。在培养论证能力的过程中,辩论常被当作生动有效的教学方式或手段。例如,批判性思维的经典教材《逻辑与当代修辞学:理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多次把特定主题的辩论活动纳入课后练习<sup>④</sup>;近

收稿日期:2022-09-12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GD22YZX0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9批面上资助项目(2021M693691)

作者简介:廖彦霖(1991—),男,广东韶关人,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非形式逻辑与论证理论研究。

①Ennis R H. “A Logical Basis for Measuring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Educational Leadership*, 1985, 43(2): 45.

②Gabbay D, Woods J. “The Practical Turn in Logic”, in Gabbay D, Guenther F (eds.). *Handbook of Philosophical Logic, Volume 13*. Dordrecht: Springer, 2015, pp. 15-122.

③范爱默伦, 斯诺克·汉克曼斯:《论证分析与评价(第二版)》,熊明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④Cavender N M, Kahane H. *Logic and Contemporary Rhetoric: The Use of Reason in Everyday Life* (11<sup>th</sup> Edition). Belmont: Wadsworth, 2009.

五十年教龄的资深批判性思维教育家布鲁克菲尔德(Stephen D. Brookfield)在其著作《批判性思维的教与学:帮助学生质疑假设的方法和工具》中,则把辩论作为中高级进阶训练的方案之一<sup>①</sup>;里亚诺(Stephen M. Llano)甚至指出,辩论能让人们对批判性思维的理解拓展到为文化向度而不只是具体技能,因此它应该作为批判性思维教学“本身”,而不仅仅是评估工具<sup>②</sup>。

虽然批判性思维教学实践中的辩论活动设计或不尽相同,但其中最正式且最常用的类型当属竞技辩论(competitive debate),亦即通常所说的“辩论赛”。竞技辩论,在论证理论的相关文献中也常被称为“校园辩论(academic debate)”或“教室辩论(classroom debate)”,指的是正反双方根据明定的题目与规则,以具有胜负决定权的裁判人员为对象,所进行的口语说服竞赛<sup>③</sup>。此处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竞技辩论的辩题通常为极具争议的政策问题(如“当今中国应不应该废除死刑?”)或价值问题(如“安乐死是不是道德的?”),辩题包含的正反双方,在逻辑上应构成矛盾关系或反对关系。第二,辩手的辩论持方由赛前抽签决定而非辩手的真实立场决定。

然而,相当部分学者对竞技辩论是否有助批判性思维培养存有疑虑,并从伦理与价值两个层面对其理论合法性提出质疑。本文把这些争议称之为竞技辩论的“伦理迷思”与“价值迷思”。能否对两大迷思作出澄清并进行辩护,事关竞技辩论能否作为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合法手段,甚至影响我们对批判性思维的整体认识。

## 二 真诚或虚伪:竞技辩论的伦理迷思

作为培养论证能力的一项教育活动,竞技辩论与一般的正式辩论(如竞选辩论、议会辩论、时事辩论)在持方选择上存在重大差异。竞技辩论

的辩手持方由赛前抽签决定,这意味着辩手的持方可能与自身的真实立场相悖。例如,一个坚信死刑不可或缺的辩手可能会抽到“当今中国应/不应该废除死刑”的正方;一个由衷认同安乐死的辩手也可能抽到“安乐死是道德的/不道德的”的反方。那么,在辩论赛场上为自己并非真心认同的立场辩护,这是否有违伦理?

梳理竞技辩论研究的学术史,我们发现早在20世纪初,学界便开始关注其中的伦理问题。1892年,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举行了美国高教界首场正式校际辩论赛。此后,竞技辩论逐渐风靡全美的大学校园<sup>④</sup>。然而,以抽签定持方为特点的竞技辩论很快引发了社会争议,甚至连美国前总统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也在其1913年出版的自传中表示:他对抽签决定持方的设定感到无法理解,并对自己在哈佛大学上学时从未参与辩论活动深感庆幸<sup>⑤</sup>。在学界的质疑声中,以美国学者墨菲(Richard Murphy)对竞技辩论的批评最具代表性。他首先提出,竞技辩论作为公共演说的一种形式,其表达应该被视为一项“公开承诺(public commitment)”。在公共演说中,阐述真实是讲者对于公众的承诺。为履行承诺,讲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向公众说出自己不认同的话,否则将有违伦理——沦为一个“公开行骗者(public liar)”<sup>⑥</sup>。

近年来,仍有不少国内学者提出与墨菲类似的批评。郝贵生认为,人们在辩论中应该运用自己所知所想,真实表述自己的观点和论证。然而现有的辩论活动以抽签决定立场,亦即“不论你抽什么题,什么题就对”,这将让整个辩论过程沦为“作秀、虚假、演戏和诡辩”。他进一步举例称,中国政法大学曾在2010年国际大学群英辩论会中,分别担任“当今社会,男人/女人更累”的正反方,并且都取得了比赛胜利。他对此评论称:“真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认识和思维方法是什么。”<sup>⑦</sup>晋

①布鲁克菲尔德:《批判性思维的教与学:帮助学生质疑假设的方法和工具》,钮跃增译,谷振诣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②Llano S M. “Debate’s Relationship to Critical Thinking”, in Davies M, Barnett R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ritical Thinking in Higher Educ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 139.

③游梓翔:《认识辩论》,双叶书廊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1页。

④Nichols E R. “A Historical Sketch of Inter-Collegiate Debating: I”,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1936, 22(2): 213.

⑤Murphy R. “The Ethics of Debating Both Sides”, *The Speech Teacher*, 1957, 6(1): 1.

⑥Murphy R. “The Ethics of Debating Both Sides”, *The Speech Teacher*, 1957, 6(1): 2.

⑦郝贵生:《大专辩论赛背离辩论的灵魂和本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30日。

荣东基于语用学视角,提出了辩论双方应当遵循一系列规范性准则,其中便包括“真诚原则(principle of sincerity)”。所谓真诚原则,是指“辩论双方应该断定他们所真正相信的东西”<sup>①</sup>。

由此,竞技辩论的伦理迷思可归结为:不论是一般言语交际还是公共演说的场合,辩论过程都应遵循真诚原则,即辩手应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否则就违背了相关的伦理规范。以论证理论学界近年兴起的“德性论证理论(virtue argumentation theory)”的视角观之,由于辩手可能会为不认同的持方辩护,因此他们似乎并不真诚,并不能算作有德性的论证者。一旦论证者具有诸如不真诚此类“论证恶习(argumentational vices)”,其论证的合理性将大打折扣<sup>②</sup>。然而,竞技辩论真的给参与者制造了如此严峻的伦理挑战吗?笔者认为,我们对此可作两点澄清。

第一,若要“表达真实信念”有意义,前提是人们已经对相关议题形成了一个较为健全的想法。而有关真诚原则的批评恰恰基于一个隐含假设,即辩手们在比赛之前就已经对辩题形成了健全的想法,从而能较理性地在一个极具争议的议题中作出正反持方的抉择。这无疑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假设。现实的情况往往是,人们在生活中易受到个人偏好、知识局限、社会压力、倾向性媒体宣传、权威迷信等因素影响,难以对某个争议性课题形成健全的看法。而通过参与不同持方的辩论,我们能够在广泛搜集资料和严格检视论证的基础上对议题进行全面分析,进而作出健全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参与竞技辩论能促进健全观点的形成,这是真诚原则的一个意义基础。或许有人会反驳,竞技辩论并非是形成健全观点的唯一路径,人们可以通过广泛阅读材料等其他方式获取健全的观点。然而,本文并非要论证竞技辩论是形成健全观点的唯一路径,只是有理由相信:在通常情况下,人们缺乏足够动力对某一议题作出全面深入的了解,而参与竞技辩论恰恰给予了他们一个深入了解议题全貌的动力。

第二,真诚原则批评所建基的另一个隐含假设是——“表达真实信念”适用于竞技辩论的情

境。诚然,“表达真实信念”适用于很多形式的正式辩论(如竞选、议会、时事辩论等)。然而,与上述形式的正式辩论不同,作为教育活动的竞技辩论并不旨在赢取实在的政治或社会利益;它作为一种高阶的理智游戏,目的在于鼓励辩手为其抽签所获得的持方尽力提供最好的论证与辩护,同时向对手的论证发起强有力的冲击。以批判性思维的视角观之,竞技辩论是一项带有教育功能的角色扮演游戏,辩手仅仅是在特定规则及情境下“扮演”某一持方的辩护者,而并不是对自己真实立场的披露。纽曼(Robert. P. Newman)在1962年发表的《匹兹堡竞技辩论守则》中写道:“在竞技辩论中,辩手对于辩题的个人信仰与其持方是不相干的。他们对于某个持方的支持,完全不是‘公开承诺’意义上的支持。倘若教练要求,他们就需要为分别支持同一议题的相反持方做足准备。”<sup>③</sup>由此可见,辩手从未在比赛中对公众承诺其真实信仰某一持方,亦即“我真实信仰该议题的正方或反方”,而仅仅是在表达一个特定情境下的状态——“我在这场比赛中担任的是正方或反方”。既然竞技辩论的情境并不涉及对真实信仰的公开承诺,那么违背真诚原则也就无从谈起。这就好比在戏剧表演的情境下,一个演员被安排扮演某个角色,即便这个角色与该演员的真实个性全然相反,我们也没有理由指责其“不真诚”。因此,有关辩手在竞技辩论过程应表达个人真实信仰的观点,实属对竞技辩论性质的误解。竞技辩论的角色扮演性质,使其成为一项具有教育功能的特殊论证活动,辩手在此过程中并不涉及真诚原则,也就无所谓违背该原则。当然,竞技辩论也需要遵循另一意义上的真诚原则——亦即在辩论过程中应当如实理解对方论证并诚实地使用证据,这一点并不会引发争议。

综上,竞技辩论的伦理迷思可得到如下澄清:在竞技辩论中,真诚原则批评所建基的两项假设均不成立。一方面,人们往往不具备健全的观点,难以在争议议题中作出理性抉择,而竞技辩论恰好有助于人们形成健全的观点,这是使得遵守真

①晋荣东:《辩论的逻辑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1期。

②Aberdein A. "Virtue in Argument", *Argumentation*, 2010, 24(2): 165-179.

③Newman R P. *The Pittsburgh Code for Academic Debate*.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62, p.7.

诚原则有意义的一项必要条件;另一方面,竞技辩论并不涉及对真实信念的承诺,故抽签定持方的制度谈不上违背真诚原则。因此,竞技辩论并未违背“真诚”这一伦理规范。要指出的是,由于上述两点澄清均可独立为竞技辩论所面临的伦理挑战进行辩护,故从论证结构而言,以上澄清为两前提的收敛结构(convergent structure)。换言之,只要上述两点澄清未被全部驳倒,对竞技辩论“不真诚”之批评便仍不能成立。

### 三 求胜或求真:竞技辩论的价值迷思

除了在伦理上受到质疑,竞技辩论的价值导向也遭到了学界的批评。针对抽签定持方的制度,墨菲首先提出质疑,社会需要的是拥有严肃信仰和深思熟虑的公民。倘若我们认为辩手的真实信念是无关紧要的,那么这样的辩论教育将背离社会的期待<sup>①</sup>。郝贵生批评,辩论赛就是即使明知对方观点正确,也要“绞尽脑汁千方百计”说成是错误的<sup>②</sup>。晋荣东认为,辩论赛“仅为胜负而辩”,并非如其他形式的辩论一样旨在“消除争议、谋求共识”<sup>③</sup>。

归结起来,竞技辩论的价值迷思可概括为两点:第一,竞技辩论旨在争胜而非求真,意味着辩手会不择手段击败论敌,把正确的观点“说成”错误的或者把错误的观点“说成”正确的;第二,即便以抽签定持方没有违背伦理规范,但这并不利于培养坚守个人信仰的公民,不符合社会对优秀公民的期待。如果这些批评成立,竞技辩论培育的显然不是德性论证理论视角下有德性的论证者,与批判性思维的初衷似乎背道而驰。笔者认为,上述批评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表明学界对竞技辩论的核心价值仍存在较大误解,对此我们可作出如下澄清。

从批判性思维教育的视角观之,竞技辩论可被看作是一种“魔鬼代言人(the devil's advocate)”的教学方法<sup>④</sup>。所谓“魔鬼代言人”,其原意指罗马天主教在其传统的封圣过程中,会专门指派一位教会律师对封圣候选人的资格进行针对性的质疑。这位被冠以“魔鬼代言人”的律师,不论其真实想法为何,都被要求对候选人的品格及事迹提出有力质疑,与候选人的拥护者进行辩论。在这个意义上,以“魔鬼代言人”来形容竞技辩论确实十分形象,它们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参与者只是扮演某个持方的辩护者,而毋须真正认同这一持方。那么,这样的辩论究竟价值何在? 竞技辩论具备多项教育功能,包括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提升决策质量、促进道德教育、发展知识整合能力、提升口语表达与说服能力、促进民主政治参与等<sup>⑤</sup>。为回应批评者的核心关切,以下将围绕竞技辩论与批判性思维的关系作简要论述。

首先,竞技辩论可视为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实战演练。如前文所述,批判性思维能力涉及语义澄清、定义评估、证据评价、论证识别、建构与评估、修辞分析、谬误分析等内容。在辩论场上,辩手需要厘清对手的语言概念包装(涉及语义澄清、定义评估、修辞分析等),即澄清对方到底想“说什么”;在此基础上,还需尽力批评对方给出的论证(涉及证据评价、论证识别、建构与评估、谬误分析等),亦即考察对方“凭什么这么说”;同时,辩手还得表达己方的论证(涉及论证建构与评估、谬误分析等)。不难发现,辩论的过程是对批判性思维能力全方位的演练与应用。如此一来,辩手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就能在论辩实战中得到锻炼与提升。这一点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艾伦(Mike Allen)等人研究发现,与公共演说及公共研讨课程相比,竞技辩论对于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提升最为显著<sup>⑥</sup>。

①Murphy R. "The Ethics of Debating Both Sides II", *The Speech Teacher*, 1963, 12(3): 247.

②郝贵生:《大专辩论赛背离辩论的灵魂和本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30日。

③晋荣东:《辩论的逻辑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1期。

④Davis R J. "Improving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nd Classroom Engagement by Playing the Devil's Advocate", *Theory, Research and Action in Urban Education*, 2013, 2(1).

⑤Freeley A J, Steinberg D L. *Argumentation and Debate: Critical Thinking for Decision Making* (12<sup>th</sup> Edition). Boston: Wadsworth, 2009, pp. 28-38.

⑥Allen M, Berkowitz S, Hunt S, Loudon A. "A Meta-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Forensics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on Critical Thinking",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1999, 48(1): 18-30.

其次,竞技辩论有利于人们做出明智决定,提升决策质量,这恰是批判性思维的目标所系。正如罗马教会的“魔鬼代言人”制度能有效考验候选人的资质,进而提升封圣的可靠性;参与竞技辩论也让辩手们有机会对正反双方的论证作出严苛审视,进而深化对议题的了解,为高质量决策奠定基础。戈维尔(Trudy Govier)曾提出“封闭视角(tunnel vision)”的概念,指思考问题时只看一面而忽略其他面向<sup>①</sup>。受制于思维惰性及价值偏好等原因,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容易落入封闭视角的思考陷阱而不自知。在当今的大数据时代,推荐算法所导致的“信息茧房”效应更是让人们容易只接收到那些自己喜欢的信息,从而让思考停留在舒适区。而竞技辩论,能够以竞争的形式迫使人们跳出舒适区,去回应对手的严苛批评或者为自己并不认同的立场辩护,这将让辩手们深刻认识到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实证研究表明,竞技辩论的训练有助于人们养成“延迟判断(suspended judgment)”的思维警觉性,即在深入了解问题之前,绝不鲁莽决策<sup>②</sup>。

除了在能力维度有助于批判性思维培养,竞技辩论在德性维度也发挥重要作用。由于辩手被要求悬置个人意见,训练自己从不同视角分析问题并扮演不同立场的辩护人,这能让他们切实体会到价值观的多元,从而促进同理心(empathy)与开放心灵的养成。戴(Dennis Day)指出,对于一些不受欢迎甚至备受压力的小众观点而言,竞技辩论“抽签定持方”的设定实际上是一个有效的保护机制。这能让辩手在没有心理负担的情况下为这些少数派发声辩护,从而对他们有更多同情的理解<sup>③</sup>。

把握这些功能之后,我们就不难对上述两项批评作出妥善回应。首先是第一项批评,即辩手会为了求胜而不惜“颠倒是非”。如上文所述,竞

技辩论要求辩手跳出思维的舒适区,对自己固有的立场进行反思与检证,对自己感到陌生甚至不认同的立场进行同情地理解。这意味着,很多被我们习惯标签为“是”或“非”的观点,很可能只是些未经理性充分检验的先入之见。因此,面对辩题的正反双方,辩手应当保持延迟判断的警觉性,不急于下是非判断。而公平倾听不同观点的开放心灵,正是论证者应有的德性之一。另外如上文所述,竞技辩论实际上是批判性思维的演练过程。因此,竞技辩论有助于双方构造出更好的论证,这恰恰是论辩求真的要义所在。

值得关注的是,将辩论的求胜与求真相对立之论调,可谓是困扰辩论多年的“长期迷思”。该论调具有非常深厚的哲学渊源,可上溯至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智者学派(sophists)”的批判。在柏拉图师徒看来,热衷参与并教导论辩的智者学派精于诡辩,擅长“使弱论证看起来变强”,这是一种践踏理性的欺骗行为<sup>④⑤</sup>。事实上,这也是学界长期以来对智者学派的固有印象。然而经过多年的研究,关于智者学派的种种误读渐被澄清,智者学派的形象正在被重新塑造。例如,夏帕(Edward Schiappa)指出,智者学派并非是通过修辞技巧让一个弱论证“看上去”变强,而是通过改善这个论证“本身”来使其变强。因此,智者学派的实践是对论证的“改良”而非对受众的“欺骗”<sup>⑥</sup>。通过广泛考察柏拉图《斐德罗篇》《申辩篇》,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高尔吉亚的《帕拉墨得斯辩护词》,阿里斯托芬的《云》,伊索克拉底的《交换法》等述及智者学派文献的多种译本及注解,廷德尔(Christopher Tindale)认为所谓智者学派“使弱论证看起来变强”其实是某些后世学者长期以来的误读。事实上,智者学派只是诉诸另一种“看待经验”的合理方式来建构新论证,并以这种“可能性论证(argu-

①Govier T. *A Practical Study of Argument (Enhanced 7<sup>th</sup> Edition)*. Boston: Wadsworth, 2014, p. 363.

②游梓翔:《认识辩论》,双叶书廊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4页。

③Day D G. “The Ethics of Democratic Debate”, *Central States Speech Journal*, 1966, 17(1): 5-14.

④Muir S A. “A Defense of the Ethics of Contemporary Debate”,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1993, 26(4): 279-280.

⑤Tindale C W. *Reason's Dark Champions: Constructive Strategies of Sophistic Argument*. Columbia: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10, pp. 19-20.

⑥Muir S A. “A Defense of the Ethics of Contemporary Debate”,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1993, 26(4): 280-281.

ment from likelihood)”来说服受众<sup>①</sup>。简言之,智者学派并不是让弱论证“看起来”变强,而是通过改善论证让其“实际上”增强。

尽管智者学派的思想重塑是一个专门的哲学史论题,且外界对于智者学派的刻板印象一时间难以扭转,但上述观点对我们认识竞技辩论仍有重要启示:竞技辩论的参与者并不是用诡辩方式去粉饰一个弱论证;而是对论证进行理性重构,改善论证本身的质量与强度,并以此拓宽人们的认知边界。在此意义上,辩论求胜绝不仅是求“语言竞技”层面的胜利,更是求“理性竞技”层面的胜利。

或许有人还会质疑:辩手若掌握了一些不利于己方的证据,一般不会在比赛中主动提出,这说明竞技辩论仍是为了求胜而非求真。再者,假设某方辩手在场上发现对方的论证确实更合理,也不能当场“倒戈”——改变立场,而只能坚守己方立场,这说明竞技辩论为了求胜而非求真。对于第一点质疑,本文的回应是:由于双方存在竞争关系,辩手当然没有义务主动提出对己方不利的证据或论证。然而,若某方辩手掌握了一些不利于己方的证据,在求胜心的驱动下,他们自然会开动批判性思维对所谓的不利证据进行分析权衡,并借此修正完善己方的论证。这同样有利于求真。对于第二点质疑,本文认为:首先,应明确竞技辩论的辩题须是极具争议的政策或价值议题,故双方都具有相当的论证空间。若某方辩手发现对方的论证“非常合理”,应当首先检讨自身对议题的把握和思考是否充分,而非责怪竞技辩论不利求真。其次,竞争机制能倒逼辩手充分开动批判性思维,用最严苛挑剔的标准去审视对方的证据和论证。这意味着,一旦代入辩手的视角,往往会发现对方提出看似合理的证据或论证实际上存在问题,而这种极高标准论证评估恰恰有助于双方最终获得一个更好的论证,即有助于求真。

由此,第一项批评已得到较为完满的回应:竞技辩论藉由竞争机制(即求胜),来更好地激励参与者开动批判性思维,进而达至追求好论证(即求真)之目的。可见在辩论目标上,求胜和求真并无内在理论冲突,且求胜成为求真的助推器。

此外,第二项批评指出,竞技辩论以抽签定持方的制度不利于培养坚守个人信仰的公民。首先,该制度是否会对个人坚守信仰产生影响,仍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其次,该制度有助于提升决策质量并促进开放心灵的养成,而这能帮助学生在复杂现实中作出明智的判断。也就是说,竞技辩论并不意味着让人不再坚守信念,而是鼓励他们在深思熟虑后再去拥抱信念。毕竟历经理性审视的信念,才更值得我们坚守。

综上,竞技辩论的价值迷思可得到如下澄清:首先,竞技辩论是对批判性思维各项能力的实践演练,其竞争机制可倒逼或激励参与者建构出更好的论证,故求胜是求真的助推器;其次,竞技辩论帮助人们更为理性慎重地坚守信念,有利于培养成熟负责的公民。

## 结语

至此,本文已对竞技辩论的迷思作出澄清,其理论合法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辩护:竞技辩论有利于批判性思维培养——在能力维度,学生可通过竞技辩论来提升对批判性思维理论工具的应用能力;在德性维度,学生可通过竞技辩论来促进理性素养与开放心灵的养成。

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本文已澄清竞技辩论的迷思,不少一线教师或许仍然对其有所保留。笔者认为,这种保留大致来自两方面:其一,“以和为贵”是中国社会长久以来的文化规训,而辩论却意味着冲突与对抗。要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大可以采取其他非对抗性的方式(如案例分析,论文写作等),何必要用论辩?其二,在一些校园辩论的实际比赛中,确实充斥着许多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因素,让辩论似乎与理性渐行渐远。

为此,笔者做如下补充:首先,应该充分认识到竞技辩论的对抗性只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育手段,建设性才是教育目的。作为一项“知识界的运动”,竞技辩论最独到的优势便是借助竞技对抗的元素,巧妙利用好胜怕输的基本人性,最大限度地激励学生们对论证进行严格检验,进而帮助论证的改进与完善。其次,我们应该清晰区分问

<sup>①</sup>Tindale C W. *Reason's Dark Champions: Constructive Strategies of Sophistic Argument*. Columbia: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10, pp. 19-27.

题的规范层面(normative aspects)与经验层面(empirical aspects)。也就是说,在实践中当然既有优秀的、追求理性的辩论比赛,也有糟糕、背离理性的辩论比赛。糟糕的比赛属于竞技辩论在经验层面出现了理解或操作偏差,而不属于规范层面的原则要求。为防止论辩背离理性,我们应当在辩论实践中加强批判性思维的引导,并且在批

判性思维的培养过程中强调其“逻辑根基”,即把演绎、归纳与辩证-范畴逻辑的知识与观念作为批判性思维课程的主要支柱<sup>①②</sup>。逻辑规律为思维活动提供了理性规范,而强化学生们对逻辑规律的掌握将有助于形成尊重论证、尊重逻辑的良好氛围,为理性辩论提供有力支持。

## The Myths and Clarification of Competitive Debates: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Thinking

LIAO Yan-li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Institute of Logic and Cogniti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20, China)

**Abstract:** Competitive debates are usually viewed as an effective means of cultivating critical thinking.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two myths of competitive debates for a long time. On the one hand, the sides of debaters are decided by drawing lots, which leads to an ethical controversy. On the other hand, competitive debates aim to win the game instead of conducting the critical discussion, which is opposite to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These myths can be clarified as follows. Competitive debates facilitate the maturing of the sound conviction, and the purpose of competitive debates is not reporting the personal beliefs of debaters, so that the ethical controversy can be resolved. Moreover, competitive debates are the practice of critical thinking. Participants pursue better arguments by competing with each other, so pursuing for victory would facilitate rationality.

**Key words:** competitive debates; critical thinking; argumentation; argumentation theory

(责任校对 葛丽萍)

①张建军:《批判性思维教育的逻辑根基》,《中国教师报》2017年11月29日。

②张建军:《高阶认知视域下的批判性思维教学与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